

贵州，雄踞我国西南腹地，北枕川渝，西连滇境，南接桂乡，融胜自云贵高原磅礴向东铺展，融于华南丘陵翠色苍茫。喀斯特地貌与密集水网，造就“八山一水一分田”生态景观，更孕育了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早期文明。

建筑，由地理和人文激荡共生。这里，侗寨鼓楼对话天地，苗家吊脚楼驯服陡坡，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客棧承载商贸记忆。荆楚、巴蜀、滇黔、粤桂文化在此交融，铸就了“多元一体”的建筑特征。

贵州人民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有开创之功：1930年，开阳人朱启铃推动成立中国营造学社；1933年，黄平人乐嘉藻出版首部《中国建筑史》。继朱、乐二公开启古建梳理后，百年来贵州古建筑保护纵深发展，乡土建筑保护更是个中重镇。早在20世纪80年代，贵州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就已将领域开拓至侗族鼓楼、风雨桥、苗族村寨、布依族民居等。自2008年起，贵州提出“村落文化景观”理念，奠定乡土建筑在贵州文物建筑保护中的核心地位。2016年，文保中心与有关方面共同启动“贵州传统建筑文化影像记忆工程”，工程现仍在持续进行。2018年以来，文保中心每年都会就一镇、一乡乃至一村的文化遗产资源进行调查。

侗族，是我国对建筑艺术有较高追求的民族。一般认为侗族由古代百越的一支发展而来。承继百越营造智慧，黔东南月亮山一带的干栏式民居至今保存完好，有“建筑化石”美誉。

早在1987年，笔者在李多扶（时任贵州省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和罗会仁（贵州省博物馆原副馆长）等老师带领下，就曾对黔东南黎平、从江、榕江及广西三江、湖南通道一带侗族建筑进行过深入调查。彼时所见鼓楼，以独特杉木塔式结构耸立村寨中央，密檐层层叠叠，檐角翘起如飞鸟展翅，飞檐斗拱间既有雕饰龙凤藻纹，也有彩绘融汇侗意象；底部多方形无墙，以四根金柱（主承柱）象征四季轮回、十二檐柱（衬柱）环列寓意月令流转的最为常见。而在鼓楼—鼓楼坪—戏台构筑的独特空间里，公共事务和世俗生活轮番上演。这些热闹场景，三十多年过去，至今难忘。

一个村寨的最核心位置，是留给鼓楼的。

侗族有三宝：鼓楼、风雨桥（花桥）和侗族大歌。其中，鼓楼是村寨最重要的景观和精神文化中心，是真正诉诸视觉意义上的文化风景。鼓楼地位崇高，村中所有大事都要到楼内处理。

目前贵州境内有鼓楼300多座，且在不断增加中。木构鼓楼往往遭遇“30年一小火，60年一大火”，再加上“破四旧”等历史原因，目前我们所见的大部分，为改革开放以后复修。据调查，真正的“老鼓楼”不超过10座。其中年代最久远者为增冲鼓楼（位于贵州省东南部从江县往洞镇增冲村），最迟应建于康熙年间，1988年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期我们还在黎平县调查发现了一座预设为乾隆年间的鼓楼。

侗族大歌中有“未曾建寨先立楼”的唱段。鼓楼对于村寨而言，是向心力的首要体现。有些村寨即便一时财力不足，村民也会先竖起“象征柱”。有条件的村寨则会建造两座鼓楼（一老一新）。在《增冲鼓楼文物保护工程报告》（贵州省文物局、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编，贵州科技出版社）一书中，我们就提到，“从原始图腾和信仰产生了最早的文化象征物，即类似图腾柱、寨柱等的建构物，它们在原始社会中期就已经出现。当然，早期侗族先民以神树为精神信仰物也不无可能，树崇拜甚至可能比图腾崇拜出现得更早”。

鼓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还曾见鼓楼的主承柱上有牛角等装饰物，为祭祀、竞技活动后所留，有的是荣耀的纪念，有的

今天（4月18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本期专题推出两文，以侗族鼓楼为镜，照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璀璨篇章。贵州学者娄清《侗族鼓楼：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里的木构华章》溯源鼓楼历史，剖析其作为族群精神象征的营造智慧与开放包容的公共性；广

东学者蔡凌《建筑是人间的鲜活记录》探讨“人+地+物+集体记忆”研究方法，展现建筑如何承载动态文化生命。两文交织，不仅是学术视角的互补，更是粤黔两地学者跨地域合作的缩影。多元对话，将有助于共筑文化遗产保护新范式。

# 侗族鼓楼：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里的木构华章

□ 娄 清



晨雾中的贵州黔东南肇兴侗寨 视觉中国供图

是挫败的铭记。

鼓楼最重要的实用功能当是击鼓传递信息，鼓可放于楼上也可置于首层。当需要预警、吆喝大家议事，鼓就会由专人敲响。“击鼓报信”“集众议事”“制定和执行款约”“踩堂祭祖”“裁决争讼”“迎宾送客”“休闲娱乐”“节日集会”，都在鼓楼内进行。（这里解释一下何为“款”。历史时期，侗族通过“款”这种社会形式来进行组织。多户血缘家庭组成“斗”，“斗”聚成寨，寨联合成“款”，“小款”由邻近几个自然村寨组成，凡牵连村寨之间纠纷，由“小款”出面解决。“小款”之上还有“中款”“大款”，乃组织形式的递进。）

作为侗族村寨的核心公共空间，鼓楼其开放性特质十分典型。尤其目前位于黔东南地区的大部分鼓楼，首层除了四根金柱和十二檐柱，余下空间无实体隔断，完全敞开。这种“敞厅式”的构造，既能避风避雨，又能消除人际阻隔。向心性与开放性的双重属性，正是鼓楼文化功能的魅力根源。它不仅凝聚族人，更包容外来者。当年我在调查时尤对“迎來送往”印象深刻，每座鼓楼里都备有水桶，内盛甘甜井水，来往行人歇息可得一口清凉。

鼓楼是村民日常的重要公共部分，提供了真正的生活场景空间。有事无事，大家都可在此闲聊、休憩、烤火。鼓楼设专人负责担水和往火塘添柴，确保温暖与秩序。同时，这里也是信息交流的枢纽，外来信息与本地经验在此交汇。鼓楼的功能是严肃的、众人的、开放的、包容的；而“三宝”里的另一“宝”风雨桥则提供了休憩和男女谈情说爱的场所，呈现闲适气氛。这种功能的对比，展现了侗族建筑对生活不同需求的巧妙回应。

鼓楼的魂，在于族人“齐心”造楼的精神气节。

作为侗族村寨的精神象征，鼓楼的建造过程具备非凡仪式感。从动议兴建到落成启用，须经过选址、备料、下墨、立架、上梁、架顶、上瓦、装饰、安鼓及贺楼等多个既定程序。其间最动人的便是大家的齐心参与。

多数侗寨在规划之初就为鼓楼预留位置，若未预留则需延请专业人士勘定吉位。鼓楼的形制规模，不仅取决于村寨规模、宗族支系和经济实力，更与村寨形成的时序、村寨间的从属关系等社会结构因素密切相关。建楼资金由全寨共筹，依各户能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彰显集体协作的精神。

掌墨师在营造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他们不仅负责设计鼓楼的整体结构，还要指导施工队伍，说是项目的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尤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三十多年前，于高增礼堂一面墙上所见的掌墨师绘于其上之草图。他根据地形、经济等现状，给“甲方”先在墙上绘出草图，这份“设计图”需经村民集体商议通过方可启建，充分体现了民众参与的传统。

到了真正建楼时刻，其速度令人惊叹。我曾亲见一座鼓楼自半夜开始竖架立楼，未至正午，主体已搭建完毕。如此速度，除有赖于掌墨师带来的数人队伍，几十位村民的齐心协力功不可没。

待得进入最后“进楼”“挂鼓”乃至“贺楼”阶段，全村男女老幼身着盛装，以唱戏对歌、通宵达旦的方式庆祝。鼓楼前灯火通明，欢声笑语交织，侗族文化的凝聚力与生命力在此刻比星河灿烂。

而目睹这样的盛大庆典，不由让人再次想起掌墨师及诸位能工巧匠。“侗族鼓楼营造技术与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术同出一脉，虽小有不同，但大抵一致，体现了中国建筑营造技术的交流与融合源远流长。鼓楼是由侗族自己的能工巧匠自行设计、自行修建的。匠师不需图纸，仅凭一把木角尺，一棵小竹竿做成的丈杆（一种尺度），一小节竹筒做成的墨斗，一支小竹片做的墨纤，沾上墨斗中的墨之后当笔使用，还有斧、锯、凿等在民间流传的古老建筑工具，便可取木建造。鼓楼用材全是杉木，并以凿榫衔接，不用一钉一铆，枋板檐挑纵横交错，利用杠杆原理，层层支撑而上，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增冲鼓楼文物保护工程报告》）

文化不是化石，动态吸收才能永续生机。

侗族鼓楼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融的典范，其演变历程，体现了多元一体的演进。它是从中国古代建筑技艺传承与创新的活态载体。

从建筑本来看，鼓楼技艺体系有深远文化传承。其起源与发展颇具特色。最初的鼓楼形态类似于方亭，样式源自民居，随着使用需求的增加，方亭逐渐“膨胀”——通过扩大开间与进深，从方形结构演变为更大空间。当空间仍显不足时，便在外围增设一圈柱子，进一步拓展空间。这种扩展方式使得鼓楼规模逐渐增大，最终通过增加层数继续满足需求。

关于独柱鼓楼（侗族早期鼓楼形式）的通心柱（中心主柱）做法，有人认为其存在是技术局限的结果，但我并不认同。三十年前，我曾写有《侗族鼓楼——古代木结构塔的实物遗存》，指出鼓楼其核心营造技艺，可追溯至汉魏时期的木构塔技术。侗族鼓楼中的独柱设计，即中间一根塔心柱（因侗族需在柱心两侧设置双火塘用于传统取暖，故平面呈方形但中心留柱），正是汉魏时期木结构塔（如汉代木塔、魏晋佛塔）的核心营造技艺。这种设计便于环形上升，梯道可环绕柱子蜿蜒而上，与早期独木梯及现代鼓楼中从第二层平台开始绕行的设计一脉相承。

这些建筑技艺是交融的结果。历史上，不同族群的交流频繁，技术学习也是常态。例如，侗族掌墨师的营造口诀与汉族《鲁班经》的核心原理是相通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民族建筑视为某个民族独立创造的产物，而应理解为多元一体文化体系下的交融结晶。

在文化交流层面，鼓楼建筑也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范式。明清侗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使内地汉文化不断深入侗区。外来移民也对该地区产生深远影响，明清之际“调北填南”“移民就宽乡”“募民垦荒”等，大量汉民进入。珠江水系移民多粤桂之风，长江水系移民多荆楚之气。移民带来的先进营造技术、生产

工具与农耕经验，深刻改变了侗族地区的物质文化基础。明清之后“得风气之先”沿江而上的粤商，及沿长江水系而来的赣商和两湖商人，促进了商贸古镇的发展，因此也提高了侗族工匠的建筑水平。例如，“随着受汉族建筑风格的影响日益加大，榕江车寨鼓楼与汉族楼阁建筑几无区别，通道坪坦阳栏鼓楼为穿斗抬梁混合结构，表明侗族地区在吸收汉式建筑方面的融合与创新”。（《增冲鼓楼文物保护工程报告》）

就珠江流域而言，侗族文化与岭南文化或百越文化之间存在联系，尽管具体研究尚未深入，但侗族地区跨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其鼓楼形制在早期便呈现出地域性差异。例如，虽然同处珠江流域，“九洞”地区鼓楼敦实稳重，“六洞”地区鼓楼则轻盈飘逸。

在时代变迁中，鼓楼文化也展现出强大适应能力。改革开放后，传统建筑技艺与现代审美意识开始碰撞出新的火花。许多鼓楼在保留核心营造技艺的同时，于彩绘、泥塑等装饰元素中融入了火车、飞机等现代意象。这种动态吸收机制也是多元一体的微观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肇兴侗寨的五座鼓楼分别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儒家伦理与侗族文化的深度融合，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极佳样本。

近年来，随着肇兴侗寨等地的旅游开发，鼓楼走入公众视野。对此，我的观点鲜明：抓住机遇，同时牢牢守住文化内核。而这个内核就是“共筑”的精神。

鼓楼和很多民族建筑，其灵魂就在于众人齐心协力的营造过程，而绝非仅仅建筑本身。在传统建造流程里，村民进山选木、掌墨师绘出草图供大家决策、各家各户在营造过程于资源、生活节奏上给予的充分支持乃至落成以后长久的运作和维护，种种仪式感和切身的投入，赋予文化以真正生命力。

今天我们谈传承，传承的核心之一就在于保留这种“共筑”精神。然而，现代建造中，村民参与度逐渐减弱，甚至出现预制组装现象，传统共筑氛围被淡化。因此，应维护村民参与的传统程序，保留其因地制宜、因材而建的经营智慧，让鼓楼不仅是建筑遗产，更是凝聚族群文化的精神符号。

同时，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鼓楼营造技艺的存续与掌墨师群体命运紧密相连，如何进一步收集、梳理匠艺流变脉络，运用当代科技手段构建传承谱系，保护并推动匠艺实践与文化语境的共生，是需要积极思考和行动的重要课题。

这些年来，我常常会思索，鼓楼和风雨桥这些动人的建筑，之所以能从千百年前的活动场所，从地域性建筑，升华为如今广为人知的文化符号，根本原因在于它始终是活态的。它活在族群的集体记忆与日常烟火中，流淌在精准的墨线与紧密的榫卯间，扎根于中华大地的山川河流。这种跨越地域的技艺对话，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写照。贵州侗寨的鼓楼，因其深植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土壤，得以穿越时空，生生不息，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

## 试论『人+地+物+集体记忆』研究范式：建筑是人间的鲜活记录

□ 蔡 凌



《陆文礼侗族鼓楼画样》，陆文礼著，蔡凌注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1月第1版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城堂村下寨鼓楼外景（资料图片）  
陈小铁 摄

2003年5月，我在黔东南肇兴侗寨调研时，结识侗族匠师陆文礼先生（1940—2021）。他是侗族建筑技艺代表人物，曾主持建造肇兴侗寨礼团鼓楼和复建地坪风雨桥，获评贵州省“高级工匠师”及“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陆文礼自40多岁起历数十年手绘完成《鼓楼图册》，包含150余页平面、剖面、构件尺寸及墨师文说明，系统记录了鼓楼营造技艺，填补了侗族建筑营造技艺仅靠口授身教传承而无系统的文字与图纸流传的空白。2020年起，我与团队对图册进行勘误、注释、数字化重绘，2025年出版《陆文礼侗族鼓楼画样》。陆先生全程参与修订，惜未能见证成书即离世。该图册首次以图纸形式系统保存侗族鼓楼营造技艺，为侗族建筑研究与技艺传承提供重要史料，具里程碑意义。

结合该书和长期研究，我认为鼓楼研究的意义之一在于为建筑史学提供一种综合视角。传统建筑史学往往侧重于研究物质本体，易忽略“人”的能动性、“地”的动态性；而单纯的人类学观察又难以深入技艺核心。“人+地+物+集体记忆”框架的提出，旨在弥合这一割裂——在匠人与社会方面，关注个体创新与集体共有，将营造视为社会形成的动态过程；在地缘实证方面，通过大量案例建立地域谱系，揭示建筑与环境的互动；在物与记忆方面，从仪式与日常生活中挖掘建筑的文化意义与活化潜力。

这一方法不仅适用于侗族鼓楼，亦可拓展至其他乡土建筑研究。它提示我们：保护文化遗产，需超越静态的“保存”，关注其作为“系统”的持续生命力。

传统的建筑史学研究，往往侧重于物质遗产的研究，而忽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其实两者很难截然分开。劳动成果虽呈现为物质遗产，但其中包含创造者及其活动过程。唯有二者兼顾，才能理解建筑遗产的生成逻辑与文化内涵。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不应仅作为“背景”。

匠师是建筑技艺的重要载体，他们的智慧与创新是建筑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陆文礼等匠师通过文字、图纸等方式留存技艺，为后人提供了宝贵资料。另一位侗族匠师杨应其应村民要求，将本地传统四边形鼓楼顶部创新为八边形，通过实践摸索出结构转换技法，逐渐成长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侗族匠师群体既依赖师徒传承积累技艺，又凭借个人智慧应对社区需求，在实践中突破固定模式——或调整建筑造型，或优化空间体量——实现着对现代审美与功能需求的敏锐反馈。

同时，我们可从中观察到官式建筑与民间建筑体系在经典与创新方面所存差异。官式建筑追求制度化、秩序性，注重经典样式的传承与稳定；而民间建筑则更自由挥洒，注重工匠（或因某个集体）对某方面的追求表达。这种差异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侗族鼓楼作为公共建筑，也显示出乡土社会中的共有关系。鼓楼不仅是建筑实体，更是社会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体现。从鼓楼筹建到落成，再到日常使用，都体现了侗族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与协作。共有关系加强了除血脉以外的社会连接，也保障着小型社会网络的稳定和发展。

因此，从建筑了解社会运作，是建筑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我认为，建筑学所言的“营造”一词，就天然包括“全流程”的意义，从谋划到实现，对全流程的理解和解释，将帮助我们窥探乡土社会的运作

地域性是鼓楼研究不可忽视的方面。通过大量案例的实证分析与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建筑形态与风格的地域性差异。侗族鼓楼在不同地域呈现不同的特色与原型，与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密切相关。

多年来，我走访调研了上百个侗族村寨、数百座鼓楼，以全面忠实记录的方法，在大量样本的基础上尝试探索出建筑原型（prototype）的共性和差异性。通过对特定地域建筑形态的观察可以发现，某些区域往往呈现出从同一原型模式演化而来的群体特征，由此可界定具有共性的地域性分布范围。这种建筑特征的地理集聚性，揭示了地域环境与营造技艺之间的深层关联。进一步，当我们结合匠师进行研究：一方面对已传承多代的匠师群体进行口述访谈和资料搜集，另一方面分析当代活跃匠师们的建筑作品，可发现其创作多基于特定建筑原型的衍生。通过大量案例的田野调查、类型学对比及文化谱系构建，我们将最终能系统性厘清“人—地—建筑”的互动关系，从而搭建一种建筑文化谱系研究框架。

我国侗族鼓楼建筑有鲜明的地域性特色：湖南地区鼓楼多采用厅堂式布局，融合穿斗式与抬梁式结构，展现出中原建筑技术的影响；贵州鼓楼则以高耸的纯穿斗式木构著称，其视觉标识性极强；广西鼓楼兼具两地特征。历史演变中，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的清代鼓楼在1949年后逐渐消失，新建鼓楼转向塔式造型。现存经典样式中，贵州的“四变八”变角鼓楼（底层四边形，三层转为八边形）和六边形、八角形非变角鼓楼被广泛接受。这些地域性特征同时具有强烈的历时性发展脉络，反映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经典范式在历史的筛选中生机勃勃。

建筑史学研究需突破单纯物质本体观察，转向“人+地+物+集体记忆”的综合视野。理解建筑不仅要分析其平面、造型、结构等本体要素，更要探究建造者、使用者及地域文化背景。

以我目睹的一场侗族“关峡门书”为例：也是在这样一个春和景明时节，插秧结束后，村民在鼓楼集会，寨老主持祭祀，众人绕萨坛巡行，然后绕行鼓楼，后至田埂举行仪式。预留的水田中，村民身着盛装，杀鸡祈福，有水牛象征性犁田，众人抛秧插秧，最后大家到风雨桥中共享合龙宴。此节庆中，萨坛、鼓楼、风雨桥等公共建筑成为仪式空间的核心载体，族群凝聚力得以加强。

此类建筑和空间在特定日子被赋予强烈仪式感，将个体与集体联结，维系社会网络稳定。与当代村落空心化对比，侗族仪式空间仍可有效凝聚社群，凸显传统建筑在地方文化中的生命力。建筑史学研究应由此切入，在物质与文化的互文中，理解建筑作为文化容器的深层意义。

建筑遗产的保护不应止步于静态保存，而应通过创造出适应现代需求的公共空间，重新激活社区的社会黏性。我们重视，传统公共建筑（如鼓楼与风雨桥）之所以能维系侗族社会的凝聚力，关键在于它们既是物理空间，也是社会关系的容器。

因此，我们在做高步侗寨“村落激活”的设计实践时，曾尝试通过“低成本、低技术、高关怀”的9个微空间案例，持续呵护和激活村落社会空间。比如改造洗衣码头为妇女交流场所，增设儿童亲水平台，植入兼具实用与人文关怀的微型书屋，以提醒在旅游开发时，人们应思考外来者能给社区所带来的积极影响，避免当地建筑和居民成为单纯的“被观看对象”。

建筑是凝固的物质，其中流淌着文化的印记。它始终是与地方、传统与当下对话的鲜活剧场。这些建筑，我们认为它从来不是被遗留下来的历史标本，它们会在每个春耕秋收的轮回里，继续生长出新的集体记忆。

（本文作者是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羊城晚报记者潘玮倩参与资料及文字整理。）

（本文作者是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文博研究馆员，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国家文物局方案审核专家组成员。羊城晚报记者潘玮倩参与资料及文字整理。）

